

书：良师益友

关于书，可谈的很多；由于太多，真不知如何谈起好。俗语所说：“一部《二十四史》不知从何说起！”书这个题目，不知比《二十四史》大多少倍。如说《二十四史》，即是说三四千年的中国历史；说一切书，那就是中外古今无所不包，更无从说起了。但任何事物也都一样，要从头说起，总是无法说的；而且，要说也非常乏味，不如先从一点具体的小事说起，即旧小说里所谓“楔子”。

这里选用的一个楔子是大多数读者的感受：书是与人终身相伴的良师益友。

英国十九世纪一位艺术评论家兼社会改革家罗斯金写过一本小有名气的书：《芝蔴与百合》，里面有一段把书比做良师益友，说得很亲切。他说，一般人总希

望得到能力比自己高的人作为师友，但社会上的知名之士并不是人人都能结交的，即使有机会见到几个，往往也只能作短暂的交谈。然而这些智力高出常人所写的著作，也就是他们的谈吐，却可以人人置备在书架上，随时供人咨询。居室里有那么一架图书，无异于拥有几十位能日常见面的最杰出的良师益友。

书是人人可以得到的良师益友，确实如此。一般的普通读者，如果屋里有两架新旧书籍，即使未能把“必读书目”所开名著都收罗齐全，至少可以聚集几十位中外古今的著名作家、思想家的代表作和读者本人偏爱的书籍于一室，许多知识上和个人生活上的问题可以随时向他们请教。他们之中有许多是不折不扣的良师；至于益友那便更多了。

中外古今传述着许多故事，某一部书或书中某一句话给人以很好的启发，引导人走上光辉的道路或事业的成功；许多人由于读到一本书而绝处逢生，甚至濒临自杀者重新振作，重大的罪犯改过自新。诸如此类；不胜枚举，那都已成为老生常谈，不必再作转述了。

至于任何一个人也总有苦闷的时候，在这种时刻书籍则是最好的慰藉者。书当然不能象职业的精神分析医生那样为患者解答疑难，排解愁思，然而，如果真以书为益友，许多好书都可以提供现成解答；真正的好书，不待你去找，随处是人生旅程中各种困恼问题的解毒剂。一不告人实际知识，二不讨论具体问题的诗歌，所以有那么许多意想不到的读者，其秘密就在这里。

“昨夜明月今夜雨，关人何事总成愁。”这是陆放翁晚年直叙心胸的诗句中似乎平常的两句。这两句诗不表示什么

具体情绪，但当你不知为什么又发闷的时候读一读这两句诗，不就会不禁莞尔一笑，觉得自己也和这老头一样可笑，随后一切释然了吗？

这样的例子多不胜数，每一个读者自己也都一定有过类似经验，只要仔细回味一下便可以体会，书籍就象老朋友那样，他们不一定直接回答你的问题，但他们谈他们自己的情绪感想，不知不觉中把你的问题融化掉了。

当然，书籍的更重要好处是起良师的作用。在大大小小的许多事务中都可以遇到不易解决的问题：小的如一个不认识的字，大的如怎样设计一座水力发电站，在适当的书里都可以获得解答。

人类社会生活中几乎所有的问题都可以在书中找到直接的或相对的解答；古今中外的书籍，恐怕也以解答问题的书占绝大部分。一切工具书、教科书、科学技术专业书籍、各门学科的理论书等等，都属此类；各种规章制度，在实际上也往往起良师作用。如果没有这些书籍，文明社会一切活动，都要陷于停顿，至少要象鲁宾逊飘流到荒岛上的情形一样。

没有工程师手册之类的必要工具书，办工厂或修建铁路等等，都不可想象；没有一本词典要学外语或做外语工作，困难也是非常之大。

做专门工作必须有专业书籍自不必说，就普通读者而论，需要求教于书籍之处亦很不少，杂字本和词典之类供解决各种日常遇到的问题的工具书之外，比方说现在已改良为《农村日历》的过去叫做“黄历”或“皇历”的东西，以及市上常常出现的所谓“日用百科全书”，那是最具体的一类

了。普通的知识读物，只要不太专门，不是非专业人员完全看不懂的书，都以某种方式充当读者的老师。

书籍作为良师，所起作用之大，范围之广，远非任何老师可比；这样的良师除在书籍中找到，是在任何地方无法访求的。古人千里访师，现在人只要常跑跑书店就可以了！

读者要解决的问题，要找人解答的问题中，最普遍的一个问题，大概是认识外在世界这个大问题。这个问题中包含许多具体的各科知识，而最主要的则是世界观问题。

人从幼小时代起在脑里就一直有那么些问题。这是什么？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是这样而不是那样？对于一切东西、一切事情都存在这些问题，但在实在生活中很少有人认真给他们解答这些问题。一旦他们发现，这些问题的解答能在书里找到；而且，书不但解答他们要问的问题，还提出许多他们从来没有想到过的新问题，并解答这些新问题，他就对书发生莫大兴趣了。许多淘气的孩子，很难说他们安静下来，但一旦他们在书里发现新天地后就废寝忘食钻在书里了。关于书的伟大作用，这是很好一个说明。

为了认识外在世界，可读的书就多了，下面只是几个大类。

一切民族都不例外，众所喜闻乐见的文献之中少不了关于本民族过去历史的著作。人总是要问自己是怎么来的，自己的祖先是怎样生活的；而当前的现实世界天天见面，即使也丰富多彩、纷乱复杂，然个人日常生活范围总比较狭小，所以不总能使人发生兴趣。世界上所以有那么许多民族史诗、各种传说，古今中外有那么许多历史著作，原因之一是人对于过去都有浓烈兴趣。

我国茶馆里说大书的主要题材之一就是讲演历史故事。

《三国演义》以至于《历代通俗演义》之类的小说总是畅销不衰。在外国情况也一样，任何国家、任何时代，历史著作总是占重要位置的；莎士比亚三十多部戏剧中有三分之一左右为历史剧；近代最著名一部通俗历史书是韦尔斯的《世界史纲》，不久前我国出版界又把它重译出版了。

人对过去发生兴趣，历史书拥有广大读者，其原因不只是好奇心，不只是缅怀过去；也许，更重要的（虽然往往未为人意识到），是为了更好地认识现在，所以要知道过去；换一句话说，里面蕴含着世界观的问题：要认识世界，必需先认识世界的过去。

到这里，出现了另一大类的书籍。只是认识过去当然还不能满足人关于周围世界所想知道的好奇心或求知欲。人的智力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必然产生想知道关于整个世界的有系统知识的要求。自古以来就是这样，各民族也无一例外，所谓哲学就是这样起源的。我们现在使用的“哲学”这个名词，是一个从希腊文里来的词，philosophia的原意是“爱好知识”；爱好知识当然一定更爱好关于整个世界的系统知识，所以，如果不是太简单化的话，哲学也就是关于整个世界观的学问或科学。

人生活在世界上远不是事事如意的！到处都是麻烦和困难，例如战争之类造成无数灾难的东西一直存在数千年之久，到今天在这个现代化的“文明”世界里还未能消灭。为了活得更好，更合理，就需要充分知道这个世界，怎样对待这个世界，这无疑必须先有一个正确的世界观。

这就是为什么有那么许多人对哲学发生兴趣，向哲学求

教不但通俗哲学书有广大读者 连看来不着边际的古典哲学名著也不容易在书店里积压下来。

和哲学书同属一大类的是各种理论书籍，主要是社会科学方面的，但象关于相对论之类的自然科学书籍往往也能不胫而走。

另一大类是为数众多的古今中外文学名著，主要是小说，但诗歌、戏剧同样都受人欢迎；这一大类通常被认为只是“益友”，实际上也是“良师”。

文学作品在西方传统上被称为所谓“美文学”。所谓“美”似乎有装饰、技巧等意思，总之饥不能食、寒不能衣，似乎是没有任何实用价值的，过去我们中国简直就称之为“闲书”了。其实，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远远不是什么无用的“闲书”，不但细心认真的读者可以从中学到许多在别处学不到的东西，对一般普通读者来说，它也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不只是“益友”，而是更好的“良师”。

文学作品中不少都是呕心沥血之作，对现实世界，主要是对于社会生活和人与人的关系，作了特殊的描述和分析。由于现实世界是通过具体形象被描写的，是经过特殊的系统被反映出来的，优秀的作品予人的印象尤其深刻。所以，从古今优秀文学名著中，不同读者都能以不同方式学到许多东西。

如巴尔扎克的小说，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多次加以称赏，给予很高的评价。恩格斯1888年4月给哈克奈斯女士的一封信中对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有这样的评语：

“……在这幅中心图画四周，他汇集了法国社会的全部历史，我从这里，甚至在经济细节方面（如革命

以后动产和不动产的重新分配)所学到的东西,也要比从当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马恩选集》卷四, 463页。)

恩格斯的话决不是过誉,从文艺作品中可以学到的东西通常可以比“正史”多,实例很多,大多数读者自己都有所体会,这主要在读书的人善于吸取。

文艺作品不只多方面反映现实中的事件,并且描述不同人物的内心生活;对人间许多崇高的感情和杰出人物的精神的描写,对读者产生很大感召力,这又是其他书籍不易做到的。因此,文学杰作由于这种陶冶性情的优点,便既是良师又是益友了。“良师”和“益友”本来没有很明确的界线,对于书籍来说尤其如此,所以,总的说来称书籍是“良师益友”的确非常恰当。

这里还要顺便一说怎样对待这些良师益友。书籍是容易得到的东西,一般说来没有什么对待上的困难,不过对待得适当与否关系很大。

这些良师益友既然能随时咨询,那只须让他们近在身边就行。做到这一点的办法是自己的小屋里有一架图书。问题在于这一架图书的选择。选择得好的话,真可以做到群贤毕集,在身边形成一个智囊团。要做到这点当然必须买一些书。要认真读书,买书是不能省免的;当然一般普通读者并不需要买太多的书,少而精也许更值得提倡。至于究竟应如何选择书籍,那是一个很有讲究的问题,而且需要人各不同,这里不能讨论了。

光是有一架图书,那还只是一堆死物,起不了任何作

用。要发挥它的潜力，还在于读者自己去使用。老师和学生总是学生走去请教，没有老师走来找学生的。书当然更不会从架上走下来。所以主动去请教是最基本的一个原则；不但主动，而且要常常请教。

书籍是不会疲劳的，对这群良师益友就更没有理由不多多请教了。但是，这决不是说不需他求。任何良师益友也都不是神而还是人，并且是已和现实有一定距离的人，真正解决现实问题，还在于对现实的认识以及人自己的实践。所谓“尽信书，不如无书”，应该是人人懂得的道理，不必多谈。不过，还可一提的是另一种情况。曾有一时天空上不知怎么刮起一阵“尽不信书”的大风；这好象也有些道理，实际是道地的“因噎废食”。当然，我们必需防止“尽信书”的错误；但“尽不信书”则更不象话，必须彻底肃清这种实际是割断历史，否认人类过去一切文化成就的虚无主义！

书籍小史

为了要清楚地了解一件事物，总得了解一点它的历史，虽然并不一定了解得很详细。如果要详细，那便成为专门学者的事了；如关于书籍的历史就可以写成洋洋数十万言，甚至数百万言的大书，这也非我所能，对于普通读者则关系本来不大，所以这里只就个人所知略谈一二。

如果把书籍定义为用文字写成的文献专集或汇编，那么尚未以专集或汇编形式存在并流传的种种古代文献（如铭刻、碑文）就不能称为书籍了；但其实，这类文献从内容上说和文献汇编之类的书籍没有什么区别，只是形式较为原始简陋、篇幅较小，没有系统而已。古代器物上的铭文可以长达数百字，碑文则往往千字以上，都是事实的记录，那显然可以称为历史记

载，并不仅为史料而已；后人把这类文献汇集成书，就是名副其实的书籍了。所以最古老的书籍文献不妨追溯到书籍出现以前的这类铭刻。可遗憾的是这类文献在未成书籍以前绝大部分都佚失了。成为书籍之后，佚失的可能就大为减少，这说明书籍有保存文献的功用。

世界上最古老的书籍大都为史书。许多民族都有长篇史诗传世。史诗实际是史书的形式之一，艺术成份较多，后人并不把史诗视为正式历史，而作为文艺创作看待，自有一定理由，但亦未必完全妥当，至少不能作这种硬性划分。因为史诗的主要内容是民族的古老传说，虽然事实和幻想混杂，但基本事实都有一定根据，即使不是严格意义的史书，至少是很重要的史料。而其实，各民族有许多官定正史又何尝全部都是事实，毫无神话成分、毫无想象和夸大呢。各民族史诗或传说，几乎没有例外，其始祖总是神和一个少女的结晶，即所谓只知其母，不知其父，这种不约而同的情况说明远古时代里都有一个母系社会。各民族传说中大都有一个洪水时代，这也是地球历史中的一个事实。

世界上最著名的史诗之一《伊利亚德》的题材是希腊人和特洛伊人的一场战争，这件事过去一直为人视作不可查考的古老神话，但后来渐渐受到考古学者的注意，最后施利曼找寻和发掘特洛伊遗址成功，终于证明这个传说故事不尽是神话，而有确实的根据。

可与特洛伊遗址发掘成功相比拟的是我国安阳殷墟的发现。在史学中向来有一种疑古之风，近代尤甚，对于我国古史很多人认为春秋以前即不可靠，司马迁《史记》的夏、商本纪被认为是无稽之谈。然而，殷墟甲骨出土，却证明“商

本纪”所记商代诸王系谱，除少数略有出入，绝大部分可用甲骨上所刻卜辞来印证。这样，古史的文献价值提高了，对古史的真实性是否可靠的看法需要改变了。

当然古史也有不可靠的，就以《史记》而论，关于苏秦、张仪的记述，也许由于司马迁以为《战国策》为信史，颇有失实之处。《战国策》本身则因马王堆帛书的发现，证明只是小说家言，不能算是可靠的史书了。

许多古史都存在可靠性的问题，但只要不是象《古文尚书》那样由于是精心泡制的伪书很难说还有什么史料价值，古史或一切古书都有一定的史料价值。史料价值是书籍历史中一个重要内容，关于古书应该多从这方面考虑。

古代物质条件落后，制作书籍不容易，能制作书籍的大概只能是权力机构，中国最古老书籍《尚书》是政权机构的文告汇编；《易经》是卜官占卜用的工具；《诗经》据说也是国家采风官吏編集；《仪礼》是权力机关主持编纂成书的习惯法。所谓古代无私学或无私家著述，未必有明文规定，事实上恐怕是私人无力从事；我国私家著作的出现大概从战国时代开始，那时物质生活有很大发展，百家蜂起，游说之士能和公族大夫争夺权力，私家著作便有可能性了。我们不少古籍，包括好几种“子书”，出现的时代当在战国时代。

印刷术未发明以前，书都是手抄；古代的抄本，抄在绢帛、皮革之类材料上，并不装订成册，而是成卷保存，所以古书上有“第一卷”、“第二卷”的划分法，实际上古代的书确是一卷一卷的。

印刷的书最初是木版雕刻印在纸上的，由于这种刻印方法，所以产生了“版本”这个词。一本书如有一百页，就有

一百块刻上字的木版；几千页的书就有几千块版子。古代印书用手工方法拓印，每次只印几百部而已，有的甚至几十部，印过以后版子就须保存起来，供以后再印。所以木版书上往往印有“×××藏版”字样，表示书版保存在何处。

书版刻成后如发现错字，也可挖改，就象现在挖改纸型一样。挖改木版的办法是把错字挖掉，版上洞穿成一个方孔，另外用一小块木头刻上改正的字嵌进孔中。也许由于这种挖改工作的启发，后来发明了活字印刷术。但以木头为原料的活字，需要把木头切成大小厚薄完全一样的小块，毕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所以在金属活字没有普及以前，印刷术仍旧沿用整块木版雕刻的方法，木质活字版没有普及。

活字印刷术真正改良完善，要到采取由铜模浇铸铅字的办法才算完成；以后又发展了压制纸型，再铸成平整的整页铅版，使印制更加方便，印刷品更加整齐清楚。大量印刷时，防止铅版磨损，还采用电镀办法使铅版硬度提高。由于铅版有一定的柔性，更可以卷在滚筒机上，滚筒机印刷可以免去铅版往返推移之劳，大大提高了印刷机的效率。

和凸版印刷术平行发展的是平版印刷。最初是在特制的平滑石版上用化学方法进行的，即所谓“石印”；后来不断改进，由石版逐步发展成为胶版，并由于照相技术等技术进步的促进，平版印刷比凸版印刷有许多更方便之处，现在，平版印刷几乎要取代凸版印刷了。

印刷术的进步一方面是客观需要，另一方面它也对书籍的传播、编写有很大促进作用。由于印刷、制版等技术的进步，印刷品生产率大为提高，印刷成本大幅度下降，许多过去由于印制成本高无法出版的书，现在很容易得到出版机会

了。还有许多在过去不易办到的事，如图片印刷之类，现在好办得多了。这些对于科学、技术、美术等方面的促进作用很大。至于印刷成本降低对一般文化学术的普及那就更不必说了。现在平版印刷术和大量印刷术的进步，对于传播信息的贡献则更其显而易见。这里说的印刷术的进展，主要是书籍印制的进展，所以实际上是书籍历史的一个侧面。

我国和世界各国的书籍出版发展情况，大致差不多（印刷术很可能是由中国传到西方去的）。我国本为最早印刷书籍的国家，历史上以出版大部头书籍著称。近代由于科学技术落后于人，出版事业上发生不能与人争胜之势；然而解放后我国出版事业蓬勃发展，出版物数量（无论种数或印数）都已达到相当高的指标，近年来各种大型工具书，如《辞海》、《辞源》、各种百科全书，再加上大、中、小学的大量教科书以及发行量惊人的农业科技书等等的出版，我国出版事业已侧身世界最先进之列，然而这仅仅还是一个开始，真正的大发展还要在不久的将来出现。

书籍出版的发展情况大致如此，一般说来它是社会文化发展的结果，同时它也促进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发展。有人把一国文化水平的高低用纸张消费量测算，有一定的道理，当然，在这种测定法里，书籍出版的水平是一个重要因素。

照上面的说法看，书籍的发展该是一帆风顺的，但实际上并不如此，也许世界上任何东西的发展都不是毫无阻难的吧。

说到书籍的灾难，首先为人想到秦始皇的焚书坑儒。焚书坑儒的实际情形究竟如何，现在不得而知，然而多少总烧

掉了不少书。其实书籍所受的大灾难并不止这样一次，实际上应该说是多不胜数，许多书籍失传，主要是这些灾难的结果。

最大的灾难大概是战乱。中外历史中历次战乱都要摧毁大量文物，书籍这种既笨重又易焚灭的东西受灾最重。我国历次改朝换代，书籍所受的损失，无法计算，其中尤以西晋末年、五代、宋末、明清之交为最严重。许多在唐代还有写本的书，经过五代之乱，在宋代已不可见。例如，《隋书·经籍志》所著录的书，许多已不能为宋人所见。现在我国善本书以宋刻本最可贵，实际上宋刻本是否宋以前古书的原来面目，是否是完全正确的旧文，问题很多。这可以从在敦煌发现的唐写本看出一些情况来。据估计，宋代所刻的书，种数相当多，但传到今天的只有寥寥无几，可以推知宋末元初毁于兵灾中数量之钜。

毁于战祸中的书籍真是所谓罄竹难书，其中最著名也最为可惜的是二万余卷，订成一万一千余大册的《永乐大典》。此书是抄本，只有正副二本，正本在明朝覆灭时全部亡失（大概是烧毁的），副本保存在清廷，但于所谓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时绝大部分与其他典籍文物焚毁，小部分被外国军人劫走，绝少数散落在民间。《永乐大典》中保存了在明初还未尽亡失的许多逸书逸文，象这样的巨帙居然可以在两次战祸中弄得荡然无存，破坏真太容易，也真太可怕了。

书籍的灾祸中，更严重的一种是由于政治、宗教原因，对书籍的戕害。满族入主中原，对旧文献中反对外族入侵的内容采取了焚毁、查禁、删削、篡改等手段，古籍在这之中所受损害极大。《四库全书》的编制名为保存典籍，实际上是检查清理，不合者不收，收入的书中有不稳的文句则加改

削。

西方，中世纪蛮族入侵欧洲，希腊罗马古籍究竟损失了多少不得而知，但基督教会多次焚毁异教文献及反教会著作，其数量之多则是肯定无疑的。埃及亚力山德里亚图书馆藏书，旧说是阿拉伯人入侵所焚，后来有人考证并不尽然，这里大量藏书之失佚，很可能也是基督教的东正教会所干的事。总之，希腊罗马著作家的著作很多，由于被毁传世的只是极小极小部份，如悲剧只传下三位作家的，喜剧的只一位。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的著作所以完整地流传下来，原因是基督教会曾经把这两位希腊哲学家尊为宏扬基督教神学的异教哲人。其他希腊罗马文献传世如此之少，就很容易获得反面理由了。

在书籍发展史中，中世纪基督教修道院修士起过制作手抄本的作用。许多古书因他们的抄写而传下来了，但他们也起了不少破坏作用。由于当时物质生产不足，抄写用的羊皮纸缺乏，修道院为教会抄写经书和圣徒传记，在得不到新的羊皮纸时就把原来抄有希腊罗马著作的羊皮纸抄本上原有字迹刮掉，用来抄宗教书籍。这种做法无疑对于希腊罗马古籍是极大的危害。后来有人发现中世纪抄本下还有一层抄本，居然发现了一些失传的书；当然，还能重新发现的只是原抄本墨迹渗入较深的抄本，渗入不够深的都被那些修士刮掉了。

教会公开焚书和焚书坑儒都被后人视为野蛮行为，似乎一去而不会再发生的事了，可是在二十世纪文明的西欧，居然又发生了纳粹党人光天化日之下在柏林、慕尼黑等大城市的广场上多次烧书，再加以后对犹太抄家所销毁的书籍，这

个数量是可观的。

六十年代十年大乱中我国也出现过烧书、毁书之风，影响之大亦颇惊人，如1969年中央各文化单位“连锅端”下放干校时，大批的书不能随行，只好送往废品收购站，精装书还必须把封面扯下才能过秤，可证确是回炉销毁的。这次书灾的程度多大很难估计，听说有人十年后回北京，出版社要重印他的著作，有几种一时竟找不到旧版，可见清扫得相当彻底了。

历史研究中最令人遗憾的是文献不足；除远古本来缺乏文献，一般情形大多数资料缺乏情况可说都由人为的灾难所造成，因此更令人引以为憾了。书籍的历史暂时简述如上，但愿以后不再发生任何人为的灾祸。

这里关于书籍内容的历史显然谈得太少了，这在后面还要较详细的谈到，为了免得前后重复，所以上面主要只谈书籍印制和发展的历史，这点简单介绍对于认识书籍也不无用处吧。

有用的书和无用的书

把书分为有用的和无用的，似乎是分类学中的两分法，但这实在并非真正的两分法。两分法的价值在于界线分明，包括无遗，对书作有用和无用之分则根本缺乏明确界线。归根到底，“有用的”这个形容词并没有明确定义，有的书一般说来一点用处也没有，但在某种特殊场合倒很有用。

然而，对于一个普通读者来说，有用、无用之分多少有些意义，甚至比削足就履的十进位分类法更有实用价值；至少就了解书籍而论，先这样分一分可以说明一些问题。

如上所说，“有用”二字实际很难定义，有些书对某些人有用，对另一些人丝毫没有用处，而有无实际用处并不决定一